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屯垦戍边

□ 高 月

屯垦戍边既是维护国家边疆稳定、推进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宝库中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屯垦戍边的组织形式、表现方式虽历经变化，但其在维护国家边疆稳定、推动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军屯与民屯——屯垦戍边的主要组织形式

屯垦即屯田垦种，指军民在一定区域驻扎聚集，从事农业生产，实现自给自足。戍边就是调集军队戍守边防。屯垦与戍边具有明显的辩证统一关系。屯垦是方式，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为戍边提供稳定的粮食物资保障。戍守边疆，是为了提高军事防御能力，进而实现边疆安全稳定发展这个最终目标，而稳定的边疆、强大的国防又反过来有力保证了屯垦实施的成效。可以说，屯垦戍边是中国古代中央王朝治理边疆过程中经济需求与政治目标的集中体现。

屯垦戍边主要有军屯与民屯两种形式。军屯指中央王朝调拨军队驻守边疆，军队战时应战，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实现自给自足。民屯是中央王朝通过政策引导、强制征发等方式将中原地区人口移居到边疆地区生产生活。尽管历史上还存在商屯、回屯、旗屯等特殊组织形式，但以屯垦的目的导向来看，不外乎增强军事防御能力的军屯和发展生产的民屯两类。

军屯制度始于西汉，民屯始于秦朝，均被历代中央王朝所沿用，是经略边疆、经营周边的重要内容，也是历代中央王朝开发边疆、促进边疆与中原交流互动的重要方式。屯垦戍边的组织形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边疆稳固的压力变化而变化。在边疆对外防御压力突出时，中央王朝以实行兵屯为主，此时的屯垦区域主要起到军事防御区的作用。当对外防御压力减弱时，中央王朝以实行民屯为主，此时的屯垦区域主要起到发展生产区的作用。

制度与实践——屯垦戍边的历史演变

早在战国时期，商鞅即在《商君书·农战》中提出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主张，是屯垦戍边思想的雏形。西汉时期，屯垦戍边思想逐渐成熟，晁错、桑弘羊、赵充国均从巩固边防的角度提出军队在边疆地区进行垦种，以降低军队驻守成本，实现长期驻守。之后，屯垦戍边思想逐渐被王朝统治者采纳成为治国理念，以此理念为指导的屯垦戍边实践贯穿中国古代历史。

屯垦戍边是古代大一统王朝治理边疆的重要方式。秦代迁徙大量人口到南岭、河套地区以充实边防。汉代以军屯为主，通过军屯为大规模人口迁徙、实行民屯提供良好的物资和环境保障。“汉武以屯田定西域”，同时解决了军事防御和粮食供应两个棘手问题，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东汉与西域“三绝三通”（即东汉对西域的经营三次中断又三次恢复的曲折经历），从正反两方面表明屯垦戍边对于边疆治理的重要意义。唐代在哈密、吐鲁番、天山北麓等地区屯垦，解决了“边防镇守，转运不给”的问题。元代将屯田作为解决军需、保障用兵的重要方式，“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明代为了“养兵而不病于农”，解决粮食转运问题，实行“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的卫所制度。清代对新疆的屯田，经历了从注重对外防御的“以屯养兵”的军屯向注重边疆社会经济发

展的民屯的转变。造成清代这种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长时间的军屯增强了防御能力，屯垦的重心和目的发生了由军向民的转变。另一方面是经过历代发展，屯垦制度日臻完善，屯垦在历代王朝边疆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已由临时措施变为根本之策。

即使在多政权并存时期，各政权也将有效治理边疆作为实现统一的重要标志。其中，效法前代的屯垦戍边模式，增强对边疆的统驭力是重要内容。曹魏承袭两汉制度，设置戊己校尉和西域长

史，分别管理高昌和楼兰的屯田，以此经营西域。西晋延续了这一做法，继续通过屯田政策加强对西域的军政管辖，接续了西汉以来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治理。

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屯垦戍边的历史价值

屯垦戍边有助于加强政治统合。人口迁徙过程以及之后进行的边疆开发与建设，为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边疆地区提供了载体。军屯使中央王朝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在距离遥远的边疆地区保持一定规模的军事力量，为中央王朝抵御外部威胁和边疆地区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提供兵源和物资保障，从而保障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政令畅通，增强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合能力。屯垦往往与地方设治前后相继。中央王朝在人口稠密、屯垦成效显著的地区会进行地方政制建设，加强民政管理，借此将中央治权拓展到边疆地区。高昌郡的设立标志着历史上首次在西域实行郡县制，也是两汉以降中央王朝加强西域屯垦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体现。唐朝在西域设立三州，以服务西域屯垦，加强对西域与中原之间战略要地的控制，对此后历代王朝治理西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屯垦戍边加强了边疆与内地、中国与域外的互通有无和贸易往来。从外部来看，屯垦戍边是巩固边防、抵御外敌的有效途径，为边疆发展创造了安全的外部环境。从内部来看，屯垦戍边将中原地区的人口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纺织、冶炼、造纸手工业技艺引入边疆地区，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并由此带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缩小了边疆与中原的差距。同时，为保障供给，中央王朝将大量物资从中原运往边疆屯戍地区，促进了边疆与中原的商贸往来。唐朝将丝绸运往西域，用于屯戍的军队购买军事和生产生活物资。这些丝绸又经商人转手销往西方，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明朝借助商人的力量将粮食等物资运往边疆屯戍地区，奖以“盐引”，“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与此

同时，屯垦戍边带来的边疆稳定为中外交通的畅通提供了保障。屯垦形成的人口聚居区往往成为中外商贸路线的重要节点。汉代将西域的一些屯田点建在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序。唐朝“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郡置于要害之路”，造就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交通畅达、商贸兴盛的良好形势。

屯垦戍边促进了文化相通与民族融合。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稳定的边疆往往能够造就中央王朝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交通的畅通促进了周边、边疆、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以人口流动为载体，域外宗教、音乐、舞蹈等文化形式进入边疆和中原地区，并与当地文化充分融合，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因屯垦进入边疆地区的中原移民，也将中原文化带到边疆地区，在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中原文化被广泛接受，增进了边疆地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此外，屯垦戍边促进了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增加了古代社会的流动性，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机会，也为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边疆地区嵌入式民族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有力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巩固。

屯垦戍边史是各民族的共同奋斗史，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在屯垦戍边的历史实践中，各民族共同抵御外敌，建设边疆，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历史上的屯垦戍边实践凝练成的历史智慧依旧指引着当代的国防和边疆建设事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当代的屯垦戍边组织形式，将卫国戍边、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边疆稳定发展紧密结合，既是借鉴历代屯垦戍边经验的因时因势之举，也是历史智慧的新实践、新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浙江上山文化的文明奠基意义

□ 蒋乐平

上山，是浙江省浦江县的一座不知名的小土丘。2000年秋冬之际，这里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定名为上山遗址。经碳十四测年，遗址年代距今约11000年至8500年。2006年11月，以上山遗址为代表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被命名为“上山文化”。

2007年至今，经过考古调查与发掘，陆续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4处。分布区域以钱塘江流域的金衢盆地为中心，向南至灵江流域。区域面积约2万多平方公里。这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为密集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约10000年前，钱塘江上游及附近地区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如此规模的上山文化遗址群？答案这里是发现了最早的稻作农业证据。农业起源是人类文明史中的重大事件，它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与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上山文化的聚落群特征，所呼应的正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这一重大的社会变革，也称之为“农业革命”。

这是有依据的。在上山文化遗址群中，普遍发现了水稻栽培、水稻收割、水稻脱壳、水稻食用的物证。比如，通过对小穗轴落粒形态、细胞植体、米粒长宽比等特征观察，植物考古学家确定遗址中发现的稻遗存为经过了驯化的栽培稻。又比如通过微痕分析，在遗址出土的石片石器的刃部发现了“镰刀光泽”，确定这就是水稻的收割工具。还有，上山文化诸遗址中，普遍发现石磨盘、石磨棒，这是配合使用的组合工具，相互磋磨，能有效将稻谷的外壳除去，加工出大米。

上山文化的村落定居证据，则主要体现在用来居住的房址和作为村落界址的壕沟的发现。尤其是被称为东亚地区最早的环境，反映了由此开启的漫长农

业社会对土地的拥有意识和家园意识的出现。

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对旧石器时代的告别。从此，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界的动物性依赖，从攫取性经济向生产性经济转变，从食物的采集者、狩猎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农业使粮食的跨季节储存成为可能，这为人类定居生活创造了条件。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劳动，也要求人们较长时间居住在一个地方，以便播种、管理、收获。更为稳定的村落社会随之出现，这促进了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聚集，由此产生了社会分工和物品交换等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就为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见，农业的起源在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

上山文化与上山文化遗址群的横空出世，正是“农业革命”带来的崭新气象，这一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形成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以浦江山山遗址为命名地的上山文化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上山文化万年水稻起源、发展的证据，是对世界农业起源认识的一次重要修订。著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题写“万年上山，世界稻源”，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誉之为“远古中华第一村”。稻作农业的起源地，是对上山文化价值意义的简明概括，也是对上山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中特殊地位的高度评价。

学术界对农业起源有三大中心之说，这三大中心分别是西亚、中美洲、东亚（以中国为主）。西亚是大小麦的起源地，起源时间约距今10000年前，位置在今天的伊朗、土耳其、约旦等地区，被称为“新月沃地”。这一地区后来诞生了两河流域文明，并衍生出埃及文明。从一定意义上讲，这里也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这一带考古工作起步

早，也是最早诞生“农业革命”概念的地区。中美洲是玉米等作物的起源地，起源时间约距今9000多年，位置在中美洲墨西哥等地。这是印第安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带回传播到旧大陆。中国是水稻、粟、黍的起源地，水稻源于长江流域，粟、黍源于黄河流域。现在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外来的麦子，而水稻则作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开来。可以认为，水稻是孕育东亚文明的具有本地基因的最重要的粮食。

因此，“东亚中心”的最重要一翼是“长江中下游中心”，这个概念的首功归于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学术界一度认为河姆渡遗址就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但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与西亚地区的早期农业遗址比较，年代的弱势较明显。

20世纪80年代开始，更早的遗址被发现。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和万年仙人洞遗址，因为年代超过12000年，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但这两个遗址的稻遗存资料比较单薄，在稻驯化特征的确定性方面存在一些争议。尤其是仙人洞、玉蟾岩均属于洞穴遗址，依然延续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呈现农业文明的新气象。而上山人走出了洞穴，占领、定居于新石器时代活动中心的旷野地带，形成一个庞大的遗址群，这与农业发生的“革命性”成果相吻合。

因此，可以认为，钱塘江流域的上山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文明的先进区域。这里的早期农业遗址与西亚早期农业遗址的年代相近。稻、麦两种分别哺育了东西方文明的粮食作物很可能

在距今10000年之际同时诞生、并行发展。

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在其经典的关于“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的论述中，认为农业起源是文明形成的开始，而城市出现则是文明形成的标志。以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以稻作文明为发展主脉，其起源优势和发展的延续优势，造就了钱塘江—杭州湾—南太湖区域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版图中的突出地位。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认识是：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年多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上山文化遗址无疑是“奠基”阶段中华文明的代表性遗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重要的具有观念形态分析价值的遗存现象。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而彩陶纹饰中出现太阳纹和线条组合极似“卦符”的神秘图案。太阳属于天象系统，在解析中华文明时，“观天象，授农事”被视为知识体系与礼仪体系形成的重要源头。上山文化的彩陶“卦符”，其中之一被研究者释读为“雷地豫卦”，它是否是后世“八卦”系统的源头？鉴于《周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话题。

这或许是上山文化所潜藏的最深刻的文明密码。

（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从考古看文明

葛维汉（1884—1962年）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博物学家。1913年葛维汉抵达四川，在四川生活和工作的长达35年，直到1948年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退休返美。在此期间，葛维汉对四川历史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相关学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显著成就。葛维汉一生为发掘、记录、保护、传播和阐释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国内外学者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开启三星堆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发掘。葛维汉曾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并凭借《四川省的宗教》一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为葛维汉深入挖掘和系统阐释中国文化提供了有力支持。

1932年，葛维汉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并教授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课程，这为他专注于学术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和支持。1934年，葛维汉运用他所学的知识，带领华西协合大学考古队对广汉三星堆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这次发掘引起了当时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三星堆遗址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古蜀世界，而葛维汉主导的发掘工作对于理解古蜀文明发展、揭示其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发现和研究中国灿烂的文化提供了宝贵材料。同时，葛维汉在发掘工作中采用了现代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早期历史进行了新的阐释。葛维汉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一方面揭开了三星堆遗址科学考古的序幕，促进了四川考古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学者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更为科学的态度探究和解释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三星堆遗址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其承载的璀璨文化能够呈现于世人面前，葛维汉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此外，在考古学领域，葛维汉也是最早对四川夔人悬棺进行研究的学者。从1932年到1936年，葛维汉多次穿梭于川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进行大量的实地勘探和田野调查，并在华西南疆研究学会创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华西南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三篇关于夔人悬棺的文章：《四川古代的白（夔）人墓葬》《川南的白（夔）人墓葬》《有关白（夔）人的历史文献》。在这三篇文章中，葛维汉对悬棺的材质、摆放位置、形状等做了详细的记录与描述，对夔人族源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探索，他的研究向世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夔人悬棺的窗口，也为后人研究夔人悬棺提供了参考。

探寻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魅力。作为文化人类学家，葛维汉的主要成就集中于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研究。他曾多次赴川康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博物学搜集和人类学考察，收集了大量关于羌族、苗族、藏族和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日用品和手制品。葛维汉对这些民族文物进行了系统描述、分类与整理，并将其制作成具有研究价值的标本。在每一次实地考察过程中，葛维汉都会拍摄大量照片，并通过笔记详细描写和记录当地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包括这些民族的历史、习俗、宗教、民歌、传说、语言和生活环境等。这些丰富的民族学调查材料包括民族文物、图片和文字资料，弥足珍贵，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四川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葛维汉不仅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记录与保护，而且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葛维汉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完成了《打箭炉之行》《藏族宗教仪式和节日的笔记》《羌族的习俗与宗教》等研究成果。其中，羌族是葛维汉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特别是对羌族的族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早开始羌族研究的外国学者是英国人陶然士，他提出羌族是古以色列人后裔的观点。葛维汉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认为羌族是中国的土著民族而绝非外来人种，并从羌族的体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探寻者

□ 冯钰伟

质特征、习俗、宗教等方面加以论证，他的相关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同。

1948年，葛维汉退休返回美国后，依然没有间断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根据之前在中国工作时搜集到的详细资料，葛维汉完成了四本著作，即《川苗的歌谣和故事》、《羌民的习俗和宗教》、《中国西南的民族宗教》、《更多川苗的歌谣和故事》（完稿未出版）。在他的著作中，葛维汉将西南地区看作一个整体，客观地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间的交融与互动。他敏锐地指出，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西南各民族在宗教和习俗上相互影响，使他们的文化不仅保留了自己的独特之处，也呈现出与其他民族文化元素相融合的特点。

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葛维汉在四川生活与工作的35年间，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大量搜集而来的神话、歌曲、经文翻译成英文，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民俗器物，这些都成为当时西方社会认识中国的重要元素，也是中美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象征。

葛维汉的搜集与保护工作还对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博物馆作为陈列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博物学的场所，以科学的视野将文物搜集与学科研究相结合，并通过举办展览充分发挥博物馆在公众教育方面的作用。这些努力使得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馆藏日益丰富，1936年该馆藏文物就达到15885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西南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1944年，为了纪念葛维汉长期以来为博物馆作出的奉献，特将图书室命名为“葛维汉图书馆”。

经过百年沉淀，目前图书馆馆藏资料涉及民国以来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等学科的珍贵资料，已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的重要平台。

